

煙



復旦大學圖書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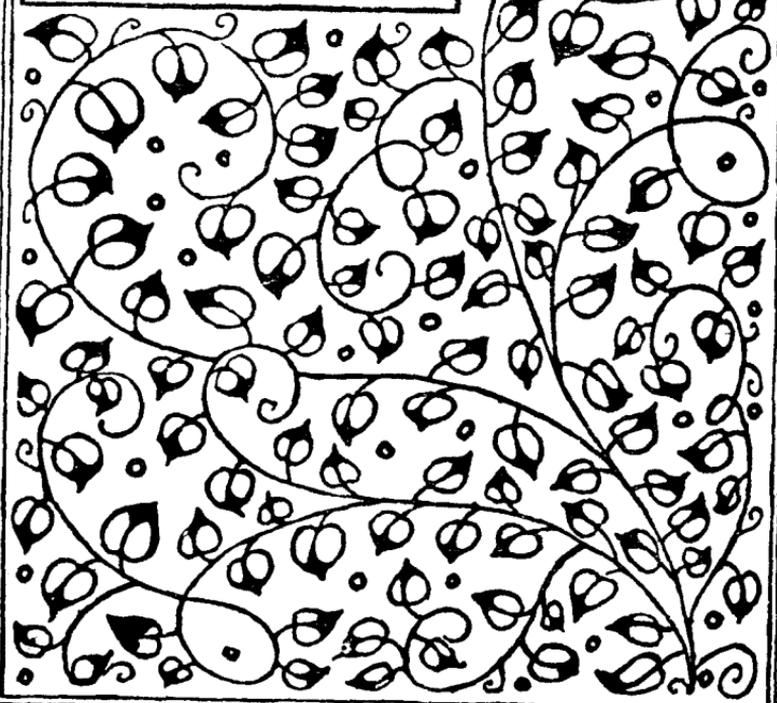
煙

I. S. Turgenev 著

樊仲雲 譯

* 文學研究會叢書 *

1933



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九日
 敝公司突遭國難總務處印刷
 所編譯所書棧房均被炸燬附
 設之涵芬樓東方圖書館尙公
 小學亦遭殃及盡付焚如三十
 五載之經營墮於一旦迭蒙
 各界慰問督望速圖恢復詞意
 懇摯銜感何窮敝館雖處境艱
 困不敢不勉爲其難因將需用
 較切各書先行覆印其他各書
 亦將次第出版惟是圖版裝製
 不能盡如原式事勢所限想荷
 鑒原謹布下忱統祈 垂督

上海商務印書館謹啓

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

中華民國十八年十一月初版
 民國廿二年 國 難 後 第 一 版
 三月印行

(二七八四)

文學研究 煙 一 冊
 會叢書

Smoke

每册定價大洋壹元貳角
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原 著 者 I. S. Turgenyev

譯 述 者 樊 仲 雲

發 行 兼 印 刷 者 商 務 印 書 館
 上海河南路

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
 上海及各埠

(本書校對者張一平)

譯序

「煙，什麼都是一陣煙！」

這是本書的主人公李維諾夫於戀愛的幻滅之後，覺得什麼都毀壞崩潰。現在是自
己運屍身回家鄉，在車上，他看見了煤煙，不禁發出這樣的感想。不但是戀愛，他覺得什麼
都是煙樣，一切一切，他自己的生活，俄國人的生活，都不過是一陣煙！

本書之所以命名曰「煙」，即由此故。

本書的著作在一八六七年；先於此者在屠格涅甫的名作中有『父與子』是一八五九年；後於此者有『新時代』（即『處女地』）是一八七六年。五十年代以前的俄國，當尼古拉斯一世的時候，是專制君主政治充分表現其橫暴的時代。一八二五年十二月黨人（Decembrist）的革命，一八三一年波蘭的叛亂，都先後爲尼古拉斯的鐵腕所削平，囚捕誅戮，備極慘酷，凡懷抱自由主義之思想者，都須受嚴酷的壓迫。所以在『父與子』中有『虛無主義』（nihilism）這一個名詞的出現。因爲在當時一般人的心中，像俄國這樣君主專制的政治以及中古時代的社會，都只有令人憤懣厭惡。他們覺得在俄國，沒有一件事是現代的，沒有一件東西是好的，反之，什麼都是陳腐惡劣。他們否認一切，他們不在威權之前低頭，他們反對一切信條，不管這威權與信條是會有許多人的尊敬的。這種新舊兩時代——父的時代與子的時代的衝突，『父與子』便是其當時的反映。

尼古拉斯一世以後，繼著爲皇的是亞歷山大二世，他與其父不同，他有一點自由主

義的氣息。所以在一八六一年有農奴解放令的頒布，一八六二年有司法審判上的改革，一八六四年每省有議會之召集，獎勵教育，建築鐵路，人民言論，亦得有相當的自由。因此之故，那時俄國的革命運動是主以和平手段來實行改革的。領袖之者爲赫臣(Alexander Herzen)。他在倫敦主辦一種刊物，名叫“KoloKol”，竭力攻擊俄國的舊制度。他主張解放與自由言論，當不受檢查官的制裁，農民當不受地主的壓迫，納稅人當不受笞刑的威脅。但是以後，因一八六三年波蘭的反叛，使亞歷山大二世一變其以前溫和的政策。波蘭的亂事是依著尼古拉斯慘酷的前例削平了，波蘭的貴族，紳士，僧侶——總之是一般上流社會中人，大大的受到了屠殺。不止如此，接著便是極端的反動，省議會(zemstvo)市議會(duma)禁止發表政見，一切行動都須受省長的監督。出版物之嚴厲檢查，現在恢復了。凡是政治犯，警察都可自由逮捕，擅行禁錮，或放逐至西伯利亞，無須正式法庭的審判。尼古拉斯的祕密偵探機關所謂第三部(third section)者，現在更加活動。當這反動的時代，一般人自不免失望，「煙」之出世，卽在此時，是反映這時代的人心的。

在『煙』當中蒲士琴的言論，自然是代表屠格涅甫的思想，是一個主張歐化的人。李維諾夫與伊林娜的戀愛算是本書的中心。屠格涅甫借着這戀愛事件作骨子，以德國巴頓地方為背景，描寫俄國貴族與黨人的生活情狀。他以深刻滑稽的語調，諷刺貴族之顛預無能，譏嘲黨人之空談無補事實。所以李維諾夫的戀愛固如煙樣風流雲散，即如黨人的理想，議論，亦何嘗不如煙樣虛無縹渺不可捉摸？

『煙，煙，什麼都是一陣煙！』

十九世紀的俄國小說，本來都帶一種悲觀憂鬱的氣分，屠格涅甫自不能例外，但在他的許多小說中，悲觀情調之最重者，怕第一要數『煙』。這是有時代社會的背景的。但是屠格涅甫雖然悲觀，在他的心底，到底懷着一片希望。李維諾夫自回家以後，父親死了，在古舊的貴紳的小邸第中，他只剩一個人了。他心緒沈鬱的，沒有希望，沒有熱情，並且沒有錢。他開始墾殖的工作。大家都知道墾殖是一種沒有興味的事，我們似用不着再來說。李維諾夫是怎樣不高興以致鋪張過甚。此時，革新的事，自然是談不到，即他從外國得來

的許多智識的應用，也只得永遠的擱着。因為窮困沒有錢，迫他每日都變更計畫，應允一切調和妥協的方法——物質的與道德的。新的患了病，舊的已失其權力了，愚妄起而與虛偽衝突。全個農村的組織動搖着，不安得有如泥深的池蕩，只見一個大字「自由」，像上帝的精靈似的在水面上漂着。比什麼都緊要的是忍耐，但忍耐要不是被動的而為主動的，堅執的……

「但是一年過去了，接著又是一年，第三年開始了。偉大的理想漸漸實現，生成血與肉，幼芽從散播着的種子中抽出，他的敵人，不論明的暗的，現在已不能踏死他了……」

原來屠格涅甫的理想，以為俄國所最需要的便是像李維諾夫樣的青年，在外國學習科學農業，而能回國實際應用的。至如那些黨人學生，不求甚解，只圖省力，想生吞活剝的輸入歐西之思想與學說，這是他所反對的。在「煙」的前六章，其諷刺之深刻，簡直是狄更斯的文字，在屠格涅甫小說中實是獨有的。

在俄國，因為強烈的壓迫與檢查，政治是不准人自由談說的，但是因為強烈的壓迫，

俄國人民益對政治感到注意，所以俄國的小說家多是政治的宣傳者，在小說中，除文學上的藝術外，還有思想與政治的宣傳。惟公開的政治宣傳，要想在俄國出版發行，是絕對的不可能，於是惟一的辦法，只有借著小說的形式，描寫俄國的生活與制度，繪出農民的情狀，使讀者自加判斷。屠格涅甫便是最長於此道的，他的『獵人日記』描寫農奴苦況，於當時的農奴解放，很有影響。

還有屠格涅甫的小說，常以戀愛事件為中心。這青春時期的人生的描寫，屠格涅甫是獨一無二的。因為他對於人心的觀察有甚深的理解，尤其是誠實的青年與端正的女郎，當其有崇高的理想與情感的覺醒，而不自知的以愛的形式來表現的時候。這種愛的描寫，在其主人公十分顯出的時候，表現的最完全。他知道人物的描寫，是不能用他的日常事務或滔滔不絕的議論來表現其特性的。欲求人物的真正性質的表現，他覺得還是着眼在主人公的戀愛關係上。因為惟有在愛上面，我們常充分的把個性表現出來，亦惟有在愛上面，我們始赤裸裸的顯出自己的真實來。

在「煙」當中，屠格涅甫攻擊得最利害的自然是凶惡腐敗的貴族，次之則為空談無益的黨人，但是他也知道這是環境與因襲所造成的，這種意志薄弱，多理想而少成功的性質，正是俄國智識階級的寫照。他的「羅亭」（一八五五）便是描寫那種只知高談闊論不能成事的人物的。

因為十九世紀中葉時一般黨人與智識階級之空談無補事實，所以到了七十年代，政治上的反動一到來，俄國的思想界，俄國的革命運動亦不期而隨之變換了一個方面。他們覺得照這樣子，俄國決不能有多大的進步，若欲俄國進步，則除非農民能夠自覺，明白俄國的情況。農民在封建的關係上雖然得了解放，但是在精神上道德上還不免是一個奴隸，千百年來的束縛，仍在其心理上留著惡的烙印。要怎樣纔能打破此精神的束縛呢？他們覺得惟有到民間去，這樣在七十年代造成了『到民間去』（V Narod or Go-to-the-People）的運動。因了熱情的鼓舞，一般上流社會的男女青年，都不惜自己犧牲，到農民中去宣傳革命。他們在鄉村中作醫生，教師，甚至工人，他們努力以求與農

民融合爲一，而宣傳其自由的福音。俄國虛無黨的領袖斯丹尼克 (Stepanuk) 當描寫當時的情狀說：

「到了一八七四年的春季，在革命青年中，一切談論都一時中止。空論的時代過去了，實行的時代在計畫中。工人的服裝——靴子襪衣等——都急急的預備停當。彼此簡捷的寒暄與問答，便是：「那兒去」「烏拉爾去」「伏爾加去」「南方去」「頓河去」等等。……大家都抱着成功的熱望，緊緊的握著拳頭。……「春季過去了，正是時候」……像電光一樣的，「到民間去」的呼聲，普遍於一般青年。他們自然都是抱着勇敢的精神，有了甚深的覺悟的，所以雖然沒有武裝與組織，他們認清了敵人，衝着暴風雨而猛進。」

(“Russia and its Crisis”, by Paul Milinkov, p. 406.)

因了這種青年的活動，於是政府的政策，愈加殘酷而反動。優秀的青年成千成百的被逮捕，或在獄中消其殘生，或被流至西伯利亞的荒野。有許多則逃至瑞士。壓力愈大，結果是反抗也愈烈。一般青年至此決定以「行動的宣傳」(propaganda of deed) 來達

到他們所懷抱的理想，於是革命運動乃更轉一新方向，有所謂恐怖主義。他們思以炸彈暗殺的恐怖手段，恐嚇官僚貴族使之讓步屈服。這樣，俄國高級官吏，無時不在炸彈，手槍，匕首的危險中。最後，亞歷山大二世亦在街上為恐怖主義者所炸死。凡此情狀，屠格涅甫在『新時代』中曾有明白的敘述。

俄國自此以後，在亞歷山大三世的治下，專制壓迫達於極點，迨至二十世紀初，尼古拉斯二世之時，乃有一九〇五年之革命。這次的革命，雖然悲慘的失敗，但是『紅色的星期日』(Red Sunday)即一九〇五年一月二十二日，俄國人民請願冬宮，科薩克兵士向之開槍之日，卻從此深印在人民腦中，革命的運動愈益深入，至一九一七年三月革命，俄皇遂不得不狼狽去位。不過革命的感憤，既已高漲，就不容易溫靜，於是至十月，又有多數黨的革命，建設蘇維埃政府，實行無產階級獨裁。這便是現今的俄國。由現今的俄國來回顧十九世紀中葉的時候，誰能相信呢？人事變幻，難道真是雲煙樣的變化無窮的麼？

本書之譯是在一九二七年九月，我從武漢歸滬的時候，曾一度載於東方雜誌，胡愈

之兄的督責和校正，是應當感謝的。其間以人事卒卒，無暇整理，直至今年八月末始付文學研究會出版。想起了兩年來的事變，何異車廂外的煤煙？『看他不絕的飛昇下降，迴環盤旋，或落在草際，或懸在樹梢，像在做滑稽的遊戲似的，漸漸伸長，漸漸消隱，一片片的飛過……不絕的變化，但接着又是一套這樣單調匆忙討厭的遊戲！有時風向變了，或者軌道偏左偏右了，於是全部煤煙突然不見，立即移至對面的窗上，又是一條巨大的尾巴在飛行……』但是身處在煤煙中的我們，是不知道要到何時風向纔發生變化的。

「煙，煙，什麼都是一陣煙！」

一八六二年十月十日下午四點鐘的時候，有大羣的人衆擁擠在巴頓巴頓有名的談話館門前。天氣晴朗，四圍的事物，像綠樹叢林，城市屋宇，以及高下起伏的山嶺，都帶着休假日的情調，暴露在和煦的陽光中，看上去像欣然的在微笑；實際上此種同樣的漠然的微笑，不論老少妍媸，都隱隱的現於面上。甚至一般面塗脂粉的巴黎娼妓也都面色欣然，絲毫不損此歡悅愉快的印象；而由她們帽上面幕上各色的絲帶，羽毛，以及金銀首

飾的光芒，令人不期而想起春日熠熠其羽的鳥的飛翔。但是話雖如此說，隨處都可聽到的法語喉音的謾罵聲，到底與春日的鳥聲不同，是不能相比並的。

一切都和平時一樣。在庭幕內的樂隊先奏了一闕採自脫來維太（*La Traviata*

意大利歌曲家 Verdi 所作歌劇）的雜曲，接着是斯脫老斯（*Strauss*）與意大利歌曲作家的華爾資曲，最後是一首俄國歌，名叫告她，係由一個忠實的指揮者譜之管絃的。至在賭博的廳上，環着綠色的桌子的，盡是些時常光臨的熟客，面貌遲鈍，都同樣現着一種貪慾的表情，這完全是賭博病的緣故，甚至最貴族的人們也不能免。其中有一個俄國地主，服飾麗都，與衆不同，係來自湯蒲武地方。他睜大着眼睛，身倚桌子而坐，神色匆遽的對於賭博監督的冷笑漫不注意。一聲“*rein ne va plus*”（還有注沒有）就見他流汗的手，把幾個金 Louis d'or（值二十四法郎）壓在賭盤的四角。看他的神氣，似乎即有可勝之機，而自己卻是無望似的。這個樣子，正好與是晚同在賭場的柯科公爵那種行所無事的態度，成一個很好的對照。柯科公爵本屬貴族，是一個有名的反對黨領袖，這次

在巴黎係託足在馬替爾特公爵夫人字下。他很榮幸，在皇帝降臨時會說過：“Madame, le principe de la propriété est profondément ébranlé en Russie.”（夫人，俄國的土地制度，真混亂極了。）à l'arbre Russe 即在俄國樹的近旁，我們的男女同胞，常聚集在一處，他們高視闊步的以一種時髦樣子走了攏來，彼此相見，都從容閒雅的寒暄着，使人一見，知道他們是受過現代高等教育的人。但是等到相見之後，一起坐下，他們卻絕對的沒有東西可以談論了，於是不得已只好說些無聊話，或法國滑稽家極陳腐卑污的諧語。這個老朽的法國滑稽家，曾經當過新聞記者，言語喋喋的像矮脚上著了猶太履，下賤的面上，長了可憎的小鬚髭的丑角一樣。他從 Charivari 及 Tintamarre 等古時的滑稽新聞中，把那些發笑的諧語零售給一般俄國太太。她們聽了之後，即大聲的鬨笑着，都像不自覺的知道外國滑稽家的佳妙，知道自己是沒有創造笑話的能力似的。可是此處所集會的，差不多全是我們交際社會的“fine fleur”（名花），是屬於上流社會的及流行的鏡子呢。就中有個X伯爵，是一個當世無匹的藝術家，音樂天資極高，和着銅

琴唱起歌來真好聽極了。但是實際上，按奏二行音符，他卻沒有不隨手亂彈的；至他唱歌的格調，則大概在窮困的吉伯色歌者與巴黎理髮師之間。又有一個受人愛慕的Q男爵，他色色俱精，無論文學、政治、演說、鬪牌，都是上手。又有一個Y公爵，他是人民與宗教的友人在酒類專賣的好時期，曾經用 *belladonna* 搗和燒酒出售與人而致鉅富。至如富有材幹的O.O.將軍，曾經歷平過什麼事，調和過什麼事，可是現在賦閒了，連自己也不知道如何是好。又如R.R.是一個有趣的胖子，據他自稱以為是最重的病夫，同時也是最佳的滑稽家；可是實際上，他卻健碩如牛，頑鈍如電桿木頭……說起來在我們現代，

R.卻是個唯一的人物，只有他還保存着四十年代，即所謂「當代的英雄」時代與華倫汀斯基伯爵夫人時代的漂亮人物的風度。此外，他還保存着特別的步態，走起路來，搖擺擺的，而 *le culte de la pose*（此語即譯俄文也很難）（譯者按此語意即身體姿勢之規律）如動作之遲緩而不自然，表情之憤然而威嚴，如盛怒不可侵犯的面容，以及用呵欠打斷人的談論，注目於自己的指甲，用鼻子冷笑，突然把帽從頭頂移下眉心等